

楊慎之 主編

屈原與中國和世界文化

湖南出版社



总序

陈彬藩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四十余年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曾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闻先生在这里使用了“唯一”二字。他的这个评价，是经过历史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的，并非随意给古人加上的桂冠。

屈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郭沫若语），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特别是辞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屈原的《楚辞》和《诗经》，同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座巍峨的高峰。东汉王逸称屈原之赋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赞屈原辞赋“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盛唐李白美称“屈平辞赋悬日月”；鲁迅盛誉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凡此千古文坛巨子对屈原作品的推崇，稍诸屈氏之文章，信非虚美。然而屈原的伟大，却不但由于他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的文学新体裁，实现了诗歌形体的一次大变革，并最先把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溶于

一体，为后世树立了二者结合的优良典范。屈原的伟大，尤在他执着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追求。屈原诗歌之所以冠盖古今，正在它熔进步的思想内容和超凡的艺术创造于一炉，而臻于情文并茂、义艺双绝的境地。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爱国者。他不计个人宠辱安危，为之终身奋斗的政治目标，就是祖国的富强和政治的修明：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

（《惜往日》）

“岂余身之憊歟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离骚》）

他热爱祖国，对宗国故土怀着深沉的情愫，虽屡遭谗被逐，却宁死不忍离去：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他热爱人民，同情人民，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因而在其作品中体现了较多的人民性和民本思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怒。”

（《哀郢》）

“愿摇起以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抽思》）

屈原非常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与锻炼，终生汲汲于自身人格美的追求：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离骚》）

“重仁龚义兮，谨厚以为未。”

（《怀沙》）

“情与质信可休兮，羌居蔽而闻彰。”

（《思美人》）

在橘颂中，屈原借赞美橘的品质，表达了自己人格美的理想：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屈原忠贞耿介、矢志不移、宁死不屈的坚强品格，更是垂范百代，曾给后世那些为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斗争的志士仁人增添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离骚》中，他反复呈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阼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在《渔父》中，屈原借答渔父之问表明自己的心迹：“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垢乎？”当需要坚守真理、正义、人格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决绝！

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理想，秉德无私，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坚持真理和正义而“九死不悔”的崇高人格，在其作品中凝结为一种被称之为“屈原精神”的东西。这种精神，经过屈原《楚辞》这一通体光华的文学载体而流传千古。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日复一日地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之沃土，潜移默化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多少为民族、为人民、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曾从屈原作品中吸取精神力

量，而蔚成民族的浩然正气；又有多少人在为正义的斗争中横遭压迫，遇到困难，饱经挫折，感到灰心的时候，由于受到屈原精神的鼓舞而勇气倍增；几乎可以说，我们民族一切有骨气的人莫不被其芳泽，只是有或深或浅，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不同罢了。从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中，不是都可隐约见到屈原精神感召和影响么！屈原中华文明的骄傲，屈原精神是永存的。

屈原不但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即被陆续翻译为德、法、英、意、日、俄等国文字，在各国人民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屈原的爱国精神、崇高人格、艺术造诣为各人民所景仰。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崇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屈原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奉献于人类文明的一颗璀璨的瑰宝。

我国当前正面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性任务。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3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现代文明是历史文明的持续和发展。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以往任何形态的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既有其阶级性、时代性的局限，又有其继承性和借鉴性的功用。我们当然不能食古不化，更应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对于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必要的整理、加工、总结、批判、继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我们今天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精神，正是为着凭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按照新的历史要求，培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奇葩。我们楚辞学界的同仁，与其它精神文明建设者一样，都是为着这朵奇葩茁壮成长而辛勤耕耘的园丁，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依仗大家的共同努力，屈原精神必将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放出新的异采。

湖南是屈原晚年活动和殉国投江之地。屈原作品中，有不少是在今湘北、湘西一带写成的。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溁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怀沙》乱辞：“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昔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湘君》：“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遵吾道兮洞庭”，“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褱兮醴浦”。正因为屈原晚年曾在湖湘一带活动多年，他的许多作品又是在湖湘一带创作的，并最后“伏清白以死直”于汨罗江，在湖南人民中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所以湖南人民对屈原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深受屈原精神的感染和鼓舞。自古以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都要以赛龙舟，吃粽子等方式纪念他。因而在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精神方面，我省楚辞学者有责任，也有条件作出更多的贡献。现在，湖南出版社决定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屈原研究丛书》，这对我省的屈原研究工作，无疑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继今年出版的易重廉先生的《中国楚辞学史》，曹

大中先生的《屈原思想与文学艺术》之后，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1991年3月于长沙

序 言

杨 慎 之

1991年6月在湖南岳阳召开了首届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中外学者共80余人，收到论文52篇和专著5本，会议的主题是：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会议围绕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屈原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书所收集的，主要是提交这次会议的优秀论文。

作为主编，在书稿编竣之后，本来毋庸晓舌费辞，但是一响喜欢唠叨的我，还是想说几句无关的话和有关的话。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粗读过屈原的某些作品，虽然似懂非懂，但是我却体验到了一种原始的感情激湍，心绪骚动不宁者久之。50年代末期，毛泽东同志来湖南，到程潜将军寓处探访，其时我任程潜的秘书，亲耳听见毛泽东在寒暄之后突然发问：“颂云先生！一部《论语》有好多字？屈原的《离骚》有好多字？”程潜谦逊从容地说：“《论语》总共13700字，《离骚》大概是2500字左右。我不精于此道，没有详细统计。”毛泽东说：“颂云先生一代儒将，博闻强记，真是名不虚传。”大概就在这段时期，我有机会看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代用毛笔楷书的《离骚》全文，气韵

飘逸，诚堪宝玩。毛泽东、程潜之间的对话，观摩学习毛泽东的珍贵墨迹，以及随后我得知毛泽东特别喜爱楚辞中的《离骚》，又一次激发了我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浮光掠影式的研究，使我多少懂得一点屈赋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屈原的爱国主义激情和独立特行的节操。但是，总的说来，对于屈学，我的的确确仍然是一个门外汉。我这个门外汉奉行一条守则：在“外行”面前绝不装腔作势，在真正的内行面前就老老实实“藏拙”，虚心学习，按照魏默深先生的话说，叫做“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既拙又巧，似乎有点油滑的味道，实际上我只是献出了一颗不说谎的心而已。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感朋友们信赖，认为我能起到一定的Cement（士敏土，即水泥）的作用，强迫我顶戴着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的花翎，因此，这本《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主编任务，就“历史地”落到我这瘦骨嶙峋的肩头上来了。掏心窝儿话说，对于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我是力所不及的。但是，我忽然想到近代中国的世界型教授陈垣先生致其哲嗣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一封家书中的一段话：

……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①

① 《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650页。

由于我怀着尊崇的心情，正在学习陈垣教授的史著和史论，因此本文对大师的言论颇多征引，信手拈来，较为方便而已。

陈垣教授又有一段话：

我以为，发表的文章，最低要求应当：

(1)，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2)，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3)闲话不说，或者少说。^①

陈垣教授的话和陈垣教授走过漫长崎岖治学道路的楷模风范，给了我挺身而出的勇气，也定下了我编辑本书的方针。以上统谓之无关的话，下面讲三点有关的话。

首先，我以为，研究屈原，研究他与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关系，尽管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着眼，但却离不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分歧和争论，看来，这种分歧和争论似乎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其实，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和分析爱国主义的内涵，把爱国主义理解得广泛一些，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范文澜同志对此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

还有一种爱国的表现。例如夏朝的关龙逢（传说中有此人，通常和比干并称），商朝的比干，楚国的屈原，他们敢言直谏，不惜杀身，要求君主改善政治。又如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徵，他们或鞠躬尽瘁，或犯颜直谏，目的也在改善政治。这两类人所爱的当然是他们的国家，但对人民是

① 《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36—639页。

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所以他们也还是爱国者。……应用这个原理到古代史上，凡是对人民多少有些益处的措施，多少对腐朽的现状有所否定，都应当予以适当的评价，但不可为欺骗手段的改良所蒙蔽。^①

对于屈原，范文澜是以“爱国者”许之的。屈原坚持节操，积极关心祖国命运，不与黑暗社会腐朽势力和光同尘，这就是屈原作为爱国者的形象长期屹立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根本原因，也是他蜚飞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屈原死后2244年，一个伟大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又在北京太平湖饮恨自尽。屈原由于要“改善政治”而殉国，是爱国；在一定意义上说来，老舍也是殉国，是爱国。巨型电影《周恩来》用了几近十分钟的画面来描绘周恩来凝视着微波荡漾的湖水，双眉紧锁，面露深忧，缅怀老舍投湖一周年。这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历史在重演，再重演，可是，它是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重演的。我认为，屈原、老舍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汨罗江和太平湖，都是震撼人心的大悲剧。一提起悲剧，人们往往把它和负数、失败联系起来；但是，在我看来，绝不能把悲剧和负数理解为失败，它们虽然属于否定的范畴，但它们促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飞跃，比喜剧、正数（亦即肯定）更具特殊价值——这就是爱国。如前引范文澜所说，屈原的爱国，断不能和我们现在强调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但他反对腐败政治，是把祖国当做一个与自己血肉相依的母体、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来看待的，它源于对祖国乡土和人民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66页。

的深情依恋和执着的爱，这是一种与生命共存的本能感情，不附加任何强制性的东西。自屈原以降，至老舍，直至今日，爱国主义都蕴藏着这种深层次的道德内容。这种立身处世之本是必不可缺的。在今天，缺少了对于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爱，偏离了使祖国繁荣强盛起来的伟大目标，忘记了用理性、科学来审视社会、人生、历史，抛弃了圣洁的爱国主义旗帜，我们将无法把祖国的伟大历史向前推进。宣传和研究屈原，亦当本此准则。

其次，研究屈原，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战国时代是否存在爱国主义类型的思想？如果有，这种思想应该如何科学地表述？如果没有，屈原的言行（包括其文学创作）作何解释？屈原进不求名、退不避祸、宠之不喜、凌之不惧的节操，是在什么历史土壤上萌发滋长的？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屈原的作品在中外文化史、文学史上应该摆在什么样的地位？它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后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深刻影响？如何理解屈原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经过艺术加工的古典神话和传说？为什么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列为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为什么屈学历两千余年之久而不衰？为什么海内外有这样多的屈学研究者和屈原崇拜者？屈原及其作品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为什么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惊人的魅力？在今天，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防止屈原式悲剧的重演？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不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来予以缜密分析，论衡判断，是很难找到正确答案的。

我又想起了陈垣教授。这位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大学者，抗日战争时期，他留在北平，写了大量的宗教史著

作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表微》，对侵略者和汉奸败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解放以后，他在人民的报纸（1949年4月于《进步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不谈政治，只谈治学，信中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双重任务”。^①1951年，在参加四川巴县土地改革后，他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谈思想收获：“读历史传记诗文的时候，如果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读，就会颠倒是非，但也不是说，所有的文字记载都应当一笔抹杀，而是说，要重新估计”，“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正确地批判”。1959年，年近八旬的陈垣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不能掌握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史学家来说，实际上是最大的苦恼和不幸，思想局限，目光狭隘，脑子里常常萦绕着许多‘不可解’的问题。因为没有指路明灯，虽然苦心孤诣地千思万想，还会惶惑不解，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陈垣教授沿着他自觉选择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解放以后，在史学研究和教育行政领导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

① 陈垣教授致胡适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全国各报转载，国外报刊也译载。《进步日报》发表了专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陈垣之路，而不要走胡适之路，影响很大。1990年，在广州，陈垣教授的大弟子刘通和教授告诉笔者：“这封信的大旨是陈垣老讲的，由我执笔。胡适读了这封公开信以后，声称这不是陈垣的手笔，有点象巴金的文风。胡老说：‘凡是按照我的授意，经过我审阅，用我的名义发表，即使是请别人代笔，也是我陈垣的东西。’”义正词严，不置颜色，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骨品德。

果。陈垣教授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我想，对于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屈原研究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陈垣教授衷心服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并把它渗透到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中去。

马列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无远弗届的威力，并且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并不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穷尽了真理，历史和现实中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后继者在坚持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总结，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完善、丰富和发展。一位哲人讲过：如果上帝有两件礼物馈赠供我选择，一件是真理，一件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我宁愿选择后者。这体现了一种磅礴的理论勇气。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基本原则，通过反复的实践，追求和探索真理。一语不及坚持，侈谈丰富和发展，未免缺乏起码的诚意。但是，没有勇气去追求和探索真理，让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僵化了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象魔鬼一样地缠着我们，那我们就一头栽入了死胡同，永无出路。思想上古代化，而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无异缘木求鱼！人要有信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信仰丝毫不能动摇，但我们又有着把科学信仰从宗教妖术中解放出来的神圣职责。研究屈原，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不敢创新突破，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哗众取宠，发表一些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或者是因袭前人的错误，照搬前人的成果，人云亦云地写些四平八稳的“套话”，变成三家村学究先生安然自足地株守着的一二高头讲章。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成不了大

气候的。

最后，研究屈原，要坚持“双百”方针，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研究方法，也要提倡和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在运用这两种方法的时候，对于鸿篇钜制和碎缣散玉，只要它们有一点新的成就和突破，都应该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这才合乎“双百”之道。所谓传统研究方法，囊括内容十分广泛，举凡考据学、目录学、训诂学、古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古典诗词文学功力根底、古史修养、资料积累以及逻辑推理演绎的能力等，都属于这个范围。这种传统方法本身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当然不能抛弃，前人据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理应受到尊重。本书所辑的过半数文章，包括外国学者的文章，就是沿着传统方法这条路子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它们考证精密，功力根底深厚，语多中的，新见迭出，证明传统研究方法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倡采取新的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所谓新方法，是相对旧方法而言的，凡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为前人未曾注意或未曾充分注意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手段，都可视为新方法。例如，比较研究、美学鉴赏、民俗民族学、屈原创作的先承和后启，区域文学、流放文学、个人心态剖析、作者性格变异、精通一至二门外语借以了解国外研究的动态和成果等等方法，都不妨有选择地、大胆而慎重地加以采用。本书所辑的许多文章，就是从不同的视角运用新颖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撰写出来的，它们别开生面，意韵盎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后有如春风扑面，清新可喜。实践证明，两种方法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道同归者无妨殊辙”，这样，也许能大大提高屈学的研究水平。

湖南省的国际龙舟节准备每年都要举行，作为这个节日

的组成部分之一——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也将力争相应召开。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们凭着一股痴迷，十分傻劲，万分热爱，无边勇气，在文学园圃中耕耘不息，以必死的生命赢得不死的艺术。

“屈原研究丛书”至此已是第三本了，我们希望连续不断地出版下去。十分感谢湖南出版社慨然承印此书，责任编辑许久文先生为此令人心感地上下奔走，使本书终于能和读者见面。可是出版事业至今尚未走出低谷，学术论著在坊间很不走俏，甚至乏人问津。在此情况下，又有哪一家必须自负盈亏、保证上交利润的出版社，敢于继续冒此风险呢？

是为序。

1992年岁首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